

美成在久

ORIENTATIONS

2015年1月 双月刊 总第3期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8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36-1337/J 国内邮发代号: 82-813 零售价: 人民币 100 元

发现新史料 | 清华简、北大简与上博简 | 崖壁上的书艺

古典家具铭款

古代青铜器、石碑上的铭刻以及摩崖石刻上的诗文，都反映了中国古老的铭文传统。又如书画上常见的作家铃印与藏家印章、题跋，雕件上捐赠者的名字及日期，明代宫廷用瓷、漆器，以及其他装饰在艺术品上的纪年款印等。社会纲纪松弛的晚明，市井工匠上行下效，将铭文刻款的做法用于制作一般民用的玉作、漆器、竹艺和青铜器等。

这类铭款一直是艺术史学家与鉴赏家的知识来源。然而，偶发性的家具铭款却不曾被重视。家具不带年代，也无款识标志，似乎已成为默认的事实。而今，笔者经二十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且收集了六百多则年代横跨十个世纪的家具铭款。这项研究的具体内容即将交由三联出版社付梓，名为《纪年古典家具图考》，是一本中国古典家具断代的汉英双语参考书。本

文撷取该书中的一章，对家具款识的性质与内容做初步探讨。

典型的家具铭款不外乎于『时间』『地点』和『人物』，内容则详载日历、节气、产地、获置点、物主名、堂号或工匠名，有时诸如价格、数量以及用料说明等信息也会出现。这类记录除作为古典家具断代的首要参考资料外，还提供了作品的历史出处，进而使得对中国传统家具史的一般认知，进一步扩大到对物件所处周边生活文化的理解。

铭款的种类

家具铭款可归纳为三大类：工匠制作完工的记录，采办或库管清册记录，其他杂项记录。

第一类为工匠或作坊的竣工记录。这类铭款常显示漆工的名字。髹漆是家具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序，外销漆器也是一门专业工艺，历来有标示年号款识的习惯。这种以『製』字收尾的年号款是典型年代铭款的句型，常见于漆器和瓷器上（图一）。此句型亦可套入工匠名，表示由某某工匠制造。半圆小炕桌带『乾隆丁丑冬月盧映之製』款即为一例。有的也用『造』字来表示，用意相同。如榆木平头案上牙头部分的隐面处，就发现有这样的款识，很可能是木刻工匠所为（图二）。款识中含『自造』和『自做』字眼的家具，表明是在自家打造的，反映了工匠走街串巷到府服务的传统。至于木匠为了便于组装家具部件而在部件上刻画或题写位置记号款识，只能算家具铭款中零碎次要的门类，不列入本文考据的范畴。

第二类铭款为采购记录。许多这类款用『置』字，表示采购或买办之意。用字如『矩置』『備』或『脩』，以及『办』等（图三），也都具有相同含义。北方的家具铭款常用『置』字，而南方则常用『备』和『办』的诸多变体字。这类铭款的上下文类型各异，可囊括日期、采购承办人、单位、摆置地点或价格，显示出更为详细的采办记录。一些特定用字包括『记』（记录）『计』（核算）『立』（立案）以及『誌』（记载）等，都是库管的记号或私有财产的标记。『记』字有时也指商号，相当于公司行号。综观家具铭款，第二类者为大宗，其中又以笔墨款者居多。



（图一）
朱砂红漆小圆角柜
公元一五八五年
奥地利维也纳 Kunstmuseum 博物馆藏



（图二）
榆木平头案
产于华北，公元一六八七年

第三类杂项铭款，内容上自诗词歌赋（图四）、纪念纪功（图五），下至谴世警语都包罗在内。在家具或屏风上偶然也出现长篇诗文款或纪念款等，通常都有姓名签署和日期，以『识』『铭』或『书』等字来表示署名人是『书写』之人，『刻并书』则表示镌刻及书写者同为一人。

固然有些铭款有可能是在原作完成很久之后才增补的，本研究所有款识的年代仍然假设与原作时间相近。至于原作时间远比自身纪年款所标示的还要早的可能性，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历法纪年

至于『时间』，中国的纪年法向来以帝王年号记录年代，详备一点的还可以注明具体年、月或日。年号如『万历』或『康熙』，系指个别皇帝的在位期间。各朝帝王在位时间长短不一，明代『泰昌』朝持续不到一年，而清代『康熙』朝则隆运连绵达六十年之久。明清时期的纪年款，有时会冠上国号『大明』或『大清』。更有趣的是，几件清中晚期的年款写出『晋大清』，其意图耐人寻味。可能与山西地区的晋商巨贾富可敌国的心态，以及清政府财政拮据，求援不断有所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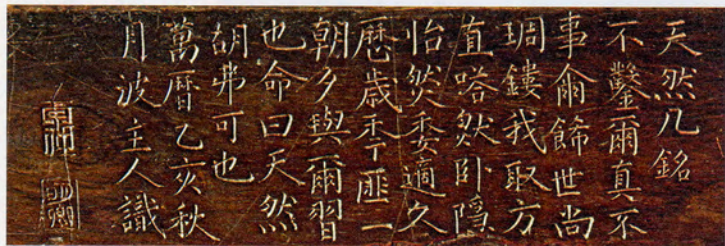
按照中国惯用的两种历法之任意一法，皆能



（图三）
梓木園背椅
产于江苏，公元一八〇五年
灵岩山房藏

具体表达确切年代。第一种是以帝王年号纪年表达。那么,『隆庆二年』就相当于公元一五六八年;第二种是根据古代六十年一周期的干支历法,以阴历五行、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配对的名称来纪年。因此,康熙丙辰年相当于公元一六七六年。纪年也有不加注年号,而以六十年一循环的干支纪年来表

(图四)
黄花梨天然几翘头板
产于江南地区 公元一五七五年
翦光阁藏



达。镌刻在铁力木桌案底侧的『黄姬水』(公元一五〇九—一五七四年)铭款就是一例。这位名人的生平素为人知,所以这里的『庚午』年得以确认为公元一五七〇年(图六)。柞针木方桌的年款则不然,『戊寅』年的范畴便无迹可循。若依风格和皮壳来看,只能鉴定为公元一七五八年,但早六十年或晚六十年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农历月令日期与否,也有被引用。十二个农历月份被古人赋予诗意的别名,如『桃月』(农历三月)『梅月』(农历四月)『柳月』(农历五月)『桂月』(农历八月)『菊月』(农历九月)等,许许多多的铭款也都选在『吉日』题笔。

人名

物主、赞助人以及工匠的名字在家具铭款中并不少见。在人名末尾加一『置』字,表示物件的主权或赞助是由某某人『买』『采办』『委办』或『定製』的。而工匠则以『木漆匠』一词见晓,后接『製』或『造』字。

罕见的名人铭款范例,则包括一件相当早的黄花梨作品(图七)。这是为纪念『霍韬』进士及第的屏风,题款上的年代相当于公元一五一四年。其他的则如『黄姬水』的铁力木桌案。诗文般的『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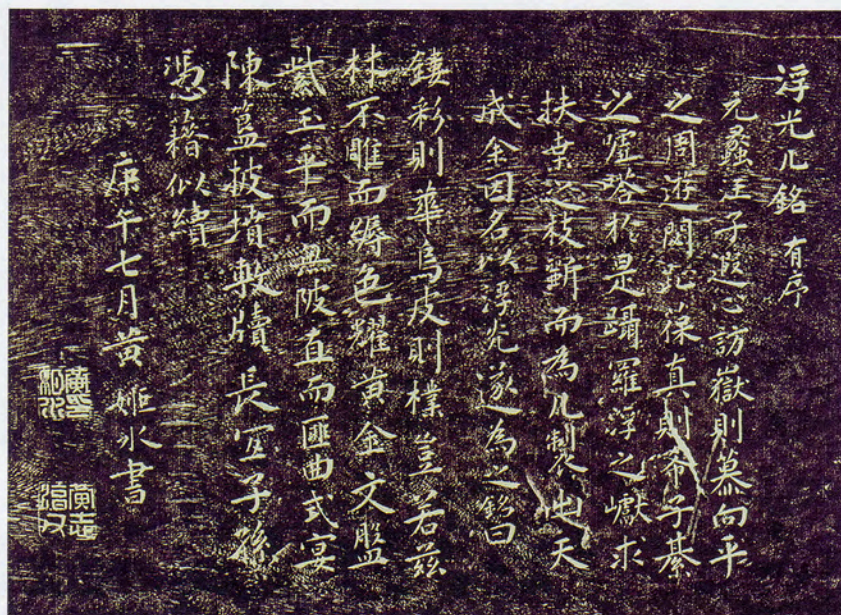
光几铭有序』铭款，年代相当于公元一五七〇年。赞颂桌几『如自然的草木，不雕而缛，色耀黄金如浮光』，这样的意境是晚明江南一带文人所喜爱的。还有一件阴文描图的石板小插屏是清代要臣山西祁寓藻题款的（图八）。然而，在家具款中发现的人名（图九），无论是个人、家族或以字号行世的人，随着韶光流转、消逝，大部分都成了不详人士。

铭款有时会写上匠师和作坊的名字。在笔者研究的六百多个案例中仅有十五例如此。如这篇为纪念与家人一起采办一件康熙年三联橱的事件长篇

署款中，木漆匠张桂廷的名字也被记录在内。家具制作行业里的各门手艺，可以在乾隆年间的一组家具款例中得到论证。几位被动员的山西工匠来自不同村庄，包括一位木匠、两位漆工还有龙王庙的一位铜匠，『木匠郭添登……漆匠人定卿县张福才，牛居村李仁隆，铜匠龙王庙李玉秀』。时隔一年，产地在安徽徽州的石心插屏（图七），有木匠黄尚文在牙条背面刻上他自己的工号款『匠工黄尚文造』。此外，民国时期的红木桌铭款提供了家具作坊的名字：『永兴木器』。



（图五）
梓木小圆角柜（对柜之一）
产于江南地区，公元一六二七年



(图六)
 铁力木翘头案
 产于江南地区 公元一五七〇年
 蜀山阁藏

地名

家具铭款也有按物件的产地或置放空间标示出处。现收藏于北京故宫的铁力木长桌铭款『崇禎庚辰仲冬製于康署』，标示了原产地为广东西部的康署，这一带出产过不少铁力木家具。在康熙时期的靠背椅铭款中（图十二），与物主名一同被记录的还有地名『屏峰』，是一个靠近浙江杭州的小村落。这件产自徽州의 榉木桌底侧，有一则油漆铭款：『江邨

復初堂』（图十三），显示椅子原属江村『復初堂』之物，该村是徽州歙县的小村庄。一则漆箱的署款表明箱子是梅林镇清河张氏赞助的。虽然『梅林』这个地名在广东、江西、福建和安徽都有，这类工艺却是典型的福建和安徽地区特色。牛居村和陆家庄也有撞名的问题，河北和山西两地都有同名的村庄。河南郑州以北的武陟县曾发现一张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的核桃木香几（图十三）。将此几与仅仅三年之隔，为紫禁城永兴寺定制的紫檀香几对比一番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图十四）。固然清中

（图七）
黄花梨嵌乌木楠木围屏
公元一五一四年



期宫廷已存在鲜明的清式风韵，鉴年的例证却默认为中国传统的一分子。出自山西运城席唐斋树声堂的数张方桌就是一例（图十五），其方角形卷纹是道光时期典型的装饰风格。出自郑州韩村敦伦堂的黑漆供桌也是道光时期河南地区的典型之作（图十六）。

『贤良寺製』署款的花几可能是出自尚存于北京的寺庙。一对瘦木面红木方桌是在上海慕尔鸣路（茂名路）自家住宅制造的（图十七），这样的证物有助于辨识地方的风格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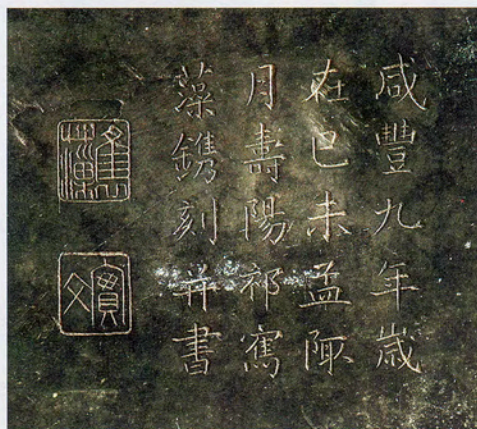
单列厅堂名的家具款也很流行，这类标示可能与家管库房清册的习惯相关；有时里坊之间因为各种祭典和节庆的需求而借调家具，堂号款对辨识家具的来源有其必要性。

价钱

买价，制作成本或修理费，也可列入铭款——此惯例也可能与家管清册息息相关。这类金额经常以银子重量或铜钱作计价单位来表示。兹举例如下：

一六八五年，康熙款抽屉桌：『山水玉棹壹張價銀壹拾兩』（见图九）。

一七二七年，雍正款二联橱：『工价良（银）



（图八）
端石插屏
产于山西，公元一八五九年
善居上海旧藏

三兩五分』。

一七三九年，乾隆款黃花梨平頭案：『製使京錢八千文』。

一七四四年，乾隆款燈掛椅：『一樣共叁拾把。木工用四兩貳分，漆工用二兩，木料釘鏢用二兩叁分，共合用銀八兩伍分』（圖十八）。

一七五二年，乾隆款食盤盒：『價銀二兩五錢』。

一七五八年，乾隆款柞榛木方桌：『此棹連腳踏計足大錢陸千貳百文』。

一七七四年，乾隆款三联櫥：『價錢壹拾千文置……書机二張，食盒二架，果盒壹隻，高燈臺對，盒則壹對，椅□六把，小方桌一件……工價錢四千令五十文』。

一七七六年，乾隆款制餅壓花木模：『價錢叁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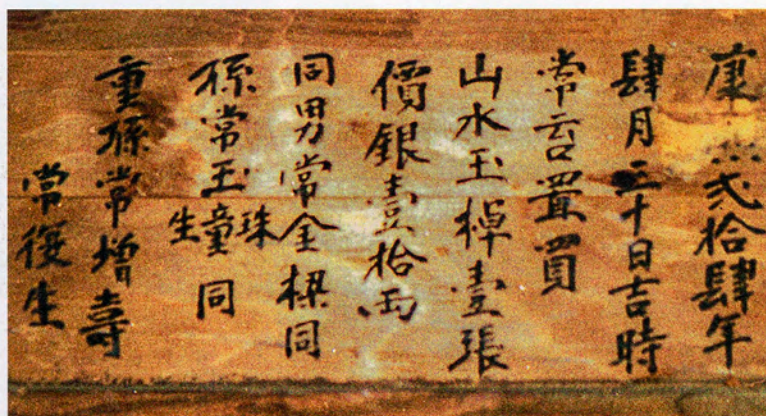
一七九二年，乾隆款供桌：『價銀二兩』。

一七九三年，乾隆款插屏：『工價銀叁兩貳』。

一八二一年，道光款条桌一對：『一樣兩張每張價叁兩伍錢』。

一八六四年，同治款条桌：『大錢九百文』。

一九二二年，民國款方桌：『紅木六仙壹對每只計工料洋捌拾元』（見圖十七）。



（圖九）
榆木鑲石板抽屜桌
產于山西，公元一六八五年
馬可休藏



(图七)
黑漆镶绿石插屏
产于安徽徽州地区，公元一七五七年
灵岩山房旧藏



(图十二)
梓木桌
产于安徽徽州地区，公元一七三二年
善居上海旧藏



康熙丙申歲屏峰駱所高置

(图十一)
柏木灯挂椅
产于浙江，公元一七一六年



家具名称

从铭款中偶尔也能一窥家具的相关术语，对古往今来家具品种和门类术语的使用能多一些了解。在一些实例中，古代家具用语并不遵循今人奉为圭臬的绝对定义是十分常见的。举例来说：图六为标



(图十三)
核桃木香几
产于河南，公元一七四二年
伯特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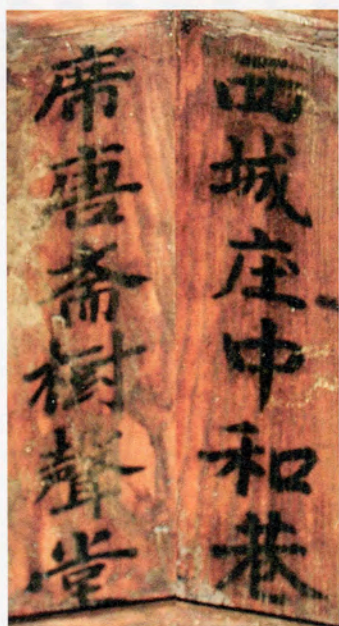
准四足缩进结构的桌子，其署款仅仅称它为『几』，而『几』一词通常专指几形结构，腿落在四角的几或小桌几；另一张四足缩进结构的桌子被认为是『书案』，而以现代『书案』的标准检视，五十三厘米宽的桌面则过于细窄，资格不符。此外，一张窄幅的架几案也被描述成『书案』，那么时下所谓『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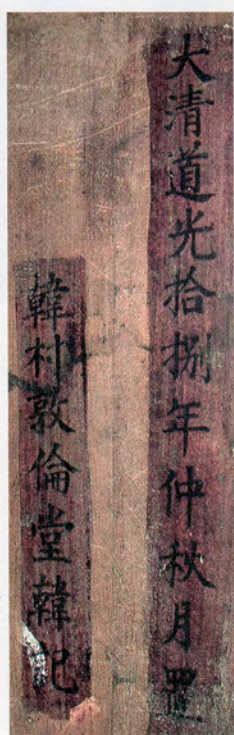
(图十四)
紫檀香几
公元一七四五年
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



(图十五)
榆木方桌 (四张之一)
产于华北地区 公元一八三三年
善居上海旧藏



(图十六)
黑漆供桌
产于华北地区 公元一八三八年



案必须有一定幅宽』的推断就备受质疑了。事实上，很多版画与绘画中的窄幅条桌都被刻画成画案使用。

反之，一张相当宽阔的桌子被署款界定为『供桌』。倘若不带铭款，这张桌子必然被归为『画案』。再者，此桌和一张缩腿结构的小『神桌』都被称为『桌』。若按王世襄定义的『桌』，则专指腿足位于四角者。因此，尽管现代术语把这两张缩腿结构形制的家具称『案』而非『桌』，但这样的归类方式未必能与古代的惯用家具术语相对应。

名实不一的难题也体现在三张闷户橱形桌上。三者形式相似，都有抽屉及闷仓，但名称却各不相同：第一张被称为『供桌』；第二张仅被称为寻常的『桌』；第三张则被称为『山水玉棹』（见图九）。如图所示，美丽的山水纹石板是『山水玉棹』的焦点所在。此三张『桌』的铭款中，没有一个标出闷仓带抽屉这样功能的名称。此类现象显示了共通性专门用语的缺乏。

『八仙桌』一词出现在明代木匠手册《鲁班经》中，书中形容是长三尺三寸、大二尺四寸的桌子。不过，一般称作大方桌的更多。据说中号和小号的方桌分别叫作『六仙』桌和『四仙』桌。对于这一说法，的确有两张小方桌的款识（见图十七）可以证实。图为民国时期的红木大方桌，牙条上的刻款称其为『玉皇香案』，桌名虽不太传统，但盛气凌人！

（图十七）
红木镶樱木六仙桌
产于上海，公元一九二三年
宁波慈溪张红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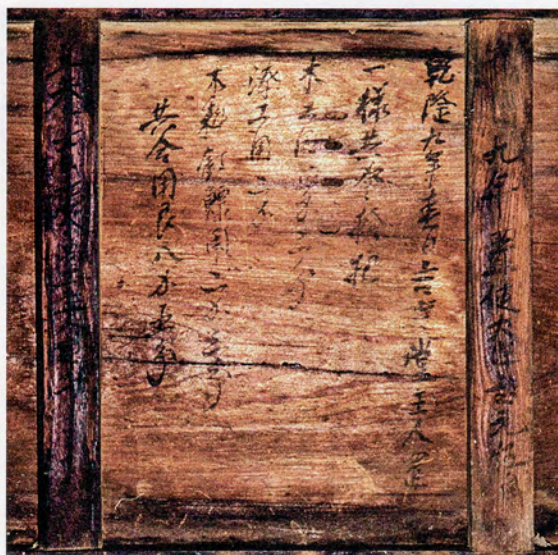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将藏书的柜子通称为『书柜』或『书架』。一对小书柜的铭款使用『书橱』一词（见图五）。在《长物志》里，文震亨也这样用字，曰：『小橱有方二尺余者，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

明崇祯年黑漆衣箱的铭款『崇祯六年五月吉日克孝置描金黑箱八个八号』有『描金』一词，描金是晚明流行的一种髹饰技法，是运用金漆线笔细细勾勒图像轮廓的装饰工艺。曾经斑斓的描金山水景物与折枝花卉，虽已消失殆尽，但署款却『现身说法』，为漆器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描金实物的当代参考资料。

家具铭款也会写上制作成对或多张成套的参考资料。据此得知，上述黑漆描金衣箱为原制一套八件中的一件（『八个八号』）。五件一模一样的三联橱都带有相同的款识『崇祯六年孟夏穀旦魁吾记棹五号』，仅仅编号不同，有五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及十七号，显示原制可能是一大套二十件或以上的组合。而椅子成套十把的（『一样十把』），十二把的（『一样十二把』），二十把的（『一样二十把』）（图十九），及三十把的（『一样共三十把』，见图十八）也有，只是有待发现散失的部分，而这成套标记则是在几把椅子的铭款中发现的。

一张典型『酒桌』形式的桌子（图二十），从其长篇诗词的刻铭也能反映出以功能取向命名家具的局限性。物主汪廷璋，为安徽歙县富有的盐商，发现该桌不仅适合当书桌或画案，也适合当琴桌或酒



（图十八）
榆木灯挂椅
产于山西，公元一七四四年
马可尔藏



桌。『歸本龍車，製規玉几。實式馮之，雲蒸霞起。匪朝伊夕，左圖右史；時一橫琴，偶然酌醴。愛此離明，文之極軌，用貽子孫。曷以欽止。』皇清乾隆十年歲在乙丑夏汪廷璋銘』。

一块发现于杭州地区的黄花梨桌板，刻款标题为『天然几銘』（见图四）。由于桌板底侧没有榫眼，意味这或许是架几案的桌板。诗文描述主人偏好不雕不饰、风格『天然』的家具——现代人们所谓的『明式』家具。『天然几銘：不鑿爾真，不事爾飾，世尚凋鏤，我取方直。嗒然臥隱，怡然委適，久歷歲年，匪一朝夕，與爾習也，命曰『天然』，胡弗可也。萬曆乙亥秋月波主人識』。

在大约五十年后出版的《长物志》（约公元一六二〇年）中，文震亨对这类桌子有相辅相成的评论：『天然几以木纹如花梨、铁梨、香楠等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长不可过八尺，厚不可过五寸，飞角处不可太尖，须平圆，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书桌式，或以古树根承之。不则用木，如台面阔厚者，空其中，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雕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

两者的观点都反映出流行于晚明江南文人之间简约、自然优雅的风格偏好，和一般大众嗜好浮夸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

修理记录

清初诗人蒲松龄在歌颂木匠的诗中，记录了工匠师傅走街串巷修理家具的传统：『器皿（桌椅等器物）解晃或破坏，加上□楔始牢坚』。旧时，修复和修理家具属司空见惯之事，与今人『用坏就丢』的现代文化相去甚远。

修复家具偶尔也记录在款识里，这是仿效建筑修葺的模式在大梁上记录修装细节。黄花梨平头案的内侧写了一则修复记录：『大清乾隆四年六月初八日製，道光貳拾玖年六月十四日復成』（图二十一），发生的时间与原始制作的乾隆初期相隔一百一十年左右。乾隆时期的佛龕也在原造一百一十五年后的光绪年间修复和重刷漆。还有一则交代来龙去脉的题识出现在小佛龕上，记录使用六十三年后的佛龕首次修复的日期、价格以及赞助人名；接着百年后，北京古董商马可乐再修题记记录一九九年的修复。

诚然，并非所有的家具都受到这样的细致记录，更有许多是被其主人疏于关注的，然而历经数百年的日常使用，这些案例反映出木家具的一般特性，即不时需要某种程度的保养或修复。

民族精神

凡家具的形式、装饰主题以及使用方式，不论种族或地域都受当地文化模式的影响。就此而言，家庭传统、祭祀先祖、追求功名及宗教情怀都会对中国家具的造型产生影响，带有民族思潮余韵的家具款偶然也会出现。

儒家思想除了提倡科举功名，也主导家族和祖先宗祠的传统。小方角柜面门上的一则长篇铭款，传达了卧病在榻的年迈父亲留给六岁稚子的箴言遗嘱（图二十二）。另外，一名自觉汗颜不及祖上科举功名的士绅，以一对小书柜的形式立了一块简陋的纪念碑（见图五），里面装满经书史籍，门板上则长篇镌刻颂扬家族名高望重的文士传统。矮桌的铭文则道出乡试放榜桌的用途。这些铭款比器物本身更能牵动读者的情感，因此更能贴近物主所属的时空世界。

透过庙堂家具以及各种祭祀礼器的款识，也能挖掘求神问道等民间习俗及宗教信仰等传统。一张供桌的起源与当地一名村民『为保佑整个村庄的福祉』做慈善捐助有关。另外一张寺庙的桌子则写上了防窃咒语：『如有私自借者，男盗女娼』。

这些记录揭开了传世器物背后缤纷的民族文化色彩以及业已失传的无数传说之点滴。



(图十九)
榆木椅（四把之一）
产于山西 公元一八三四年
马可·波罗

技法

家具款识大多数以墨或漆书写，许多落款的位置一般都不在视线所及范围之内，如椅、桌的内侧或柜子的里面。时间会使墨款褪色，因此字迹模糊的破旧款识常常需要仔细贴近检视，否则难以辨识。由此，不难理解何以深色漆表的器物普遍以色漆书款。

刻款不如墨款寻常，其中又以阴刻手法表现居多。另外的针刻细字漆款，也反映了漆器传统中常用的标准铭款技法。

比较少见的阳刻款范例可见于雍正年卧榻的腿侧（图二十三）和紫檀香几（见图十四）的束腰上。其他的铭款技法包括堆漆书款以及山西地区独特的『针戳手工铁艺』珠点纹铭款，如提盒所示（图二十四）。

伪款

如同许多中国艺术门类都有伪款，家具也存在可疑铭款的问题。胡德生曾公开指出，北京故宫至少有一件宣德伪款的髹漆家具，似乎是万历时期造的。不过，不同于其他收藏史悠久的门类，大多数的家具伪款年代相对较晚，反映家具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收藏领域。



(图二一)
红漆酒桌
产于江苏，公元一七四五年
扬州博物馆藏

歸本號車標規玉凡寶式馮之雲徽霞起匪朝伊夕左國右史
時一橫琴偶然酌醒愛此離明文之極枕用詒子孫昌公欽止
皇清乾隆十年歲在乙丑夏汪廷璋銘

在过去几年的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明代伪款，其中大部分是被一些机灵的古董商在看似无破绽的明代仿品上添加年款以拉抬售价。此外，名人伪款也出现了，对此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务必小心推敲。大多数伪款中，以明代纪年款居多，早清纪年款仅仅是刚刚开始被发掘（又一次反映了民间『贵明贱清』的态度，使主观断代脱离不了有色眼光）。

一个相当明显的伪款例证可见于带『嘉靖庚午』墨款的靠背上（图二十五）。嘉靖朝始末于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彼时的庚午年却落在公元一五一〇年和一五七〇年上——两者都不在嘉靖年间。尽管靠背是真正的开门老货，年份看似相当，但墨款文句过于简化，粗体墨笔字看似浮写在古老皮壳上，渗入不深。

还有一些是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互不吻合的案例，很可能是疆土辽阔，偏远地区资讯不发达，无知于改朝换代或其他原因使然。例如『崇祯辛丑年』铭款的橱柜，意指崇祯死后的那十七年，也是明王朝覆亡（公元一六四四年）后的十七年。忠贞爱国的晚明志士究竟不顾顺治时代的来临，积极图谋反清复明，拒不承认这外来的统治者。此橱柜的年款可能反映了这种心情，照样在辛丑前冠上『崇祯』年号。



(图二十一)
黄花梨平头案
产华北地区，公元一七三九年
Nicholas Grindley 藏

至于刻款或书款是否与周围的皮壳有『百年好(结)合』的实质成分，使用放大镜即能真相大白。伪造的铭文难以渗入陈年的表壳内。此外，后加款终究会露出作假风格或书写技法的马脚。

结语

家具铭款确实是探索中国家具的一个新领域。往后几年，必然会发掘更深入的素材，增添有趣的发现，并公诸于世。这样的文字记录，虽然是刻在家具上，但却提供了大量传统家具周边文化和历史的讯息，是一种可触摸的历史和文化。○

(图十三)
黑漆小柜
产于华北地区，公元一八三二年
马可东藏



(图二十四)
大提盒
产于华北地区，公元一七四〇年
马可东藏

(图二十三)
榆木凉榻
产于华北地区，公元一七三〇年



(图二十五)
靠背
产地不详